

· 专题研究 ·

近代华侨华人捐建侨乡图书馆的模式、动因及影响

邓玉祥

(东莞松山湖图书馆,广东 东莞 523808)

摘要:现代图书馆是全民阅读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近代侨乡图书馆在华侨华人与地方协同下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华侨捐建不仅弥补了国家财政不足造成的公共文化设施缺口,而且借新图书馆运动引入了西方现代图书馆理念,推动了侨乡图书馆从传统藏书楼向现代公共图书馆转型。文章以粤闽侨乡图书馆为对象,依据档案与侨刊史料,归纳出完全捐建、捐资扩建、专项捐赠三种模式,并从文化认同、民族救亡、理念引入、地方社会维系四个层面进行了动因分析。

关键词:华侨华人;侨乡图书馆;图书馆建设

中图分类号:G2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80(2026)02-0045-06

0 引言

图书馆作为搜集、保存、整理并传播文献信息资源的公益性文化机构,核心价值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的知识服务^[1]。不同于古代仅供少数文人士绅查阅的藏书楼,现代图书馆兼具知识存储、学术研究、文化传播与社会教育等多重功能,是推动全民阅读普及、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其作用无可替代^[2]。近代以来,国内侨乡的图书馆事业迎来发展契机,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倾力支持下实现了长足发展,不仅图书馆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馆藏资源的储备与公共服务的内容也得到极大丰富。尤其在文化交流与传承方面,侨乡图书馆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开展学术讲座、推进数字化服务项目建设等方式,有效激发了当地的文化活力,切实推动了地方社会的进步。华侨华人参与侨乡图书馆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侨资主导、地方协同”的独特发展模式。

整体来看,学界关于侨乡图书馆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3-5],但多聚焦于个案描述,缺乏对华侨捐助行为的系统性梳理和整体性探讨。鉴于此,本文以广东、福建等侨乡核心区域的图书馆为研究对

象,结合地方档案与侨刊史料,尝试分析华侨捐助侨乡图书馆的模式类型、背后的动因差异,并探讨这一行为对侨乡地方文化生态产生的长远影响。

1 模式与类型

近代以来,随着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不断壮大,侨乡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逐渐受到重视^[6]。根据地方志及图书馆史料记载,广东、福建、海南、浙江等为主要侨乡区域。侨乡地区包括广东省的江门五邑地区、潮汕地区、中山市、佛山市,福建省的泉州、厦门、漳州,海南省的文昌、琼海,浙江省的温州、丽水等地。晚清时期,由于内忧外患加剧,清政府无力承担地方教育文化建设,许多青年或为谋生计,或为寻求救国之道,纷纷下南洋、闯金山,形成了以广东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福建晋江、石狮,海南文昌、澄迈,浙江青田为代表的著名侨乡^[7]。

1.1 完全捐建模式

进入民国时期,侨胞与侨乡的联系日益紧密,在爱国情怀和乡土意识的驱使下,广大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积极捐助家乡建设,其中图书馆的建设尤

收稿日期:2025-05-21 定稿日期:2026-04-08

作者简介:邓玉祥(1981—),男,本科,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和资源建设。E-mail:80638534@qq.com

引文格式:邓玉祥.近代华侨华人捐建侨乡图书馆的模式、动因及影响[J].晋图学刊,2026(2):45-50.

为突出。在侨资的捐助之下,图书馆的建设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公共文化体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近代由侨胞捐建的图书馆,很多对于推动当地知识传播、促进社会进步是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作用的。例如,位于广东台山市的台山图书馆,被誉为“岭南侨乡文化之光”^[8],台山图书馆最早由华侨独立承担馆舍建设与初期运营资金。台山图书馆的完全捐建模式为后续侨乡图书馆提供了“侨资主导”范本,它的三次扩建均依赖华侨持续注资。又如海南文昌图书馆最早由泰国华侨韩文华独资捐建,为当时海南唯一县级公共图书馆,采用中西合璧建筑风格,设阅览室、藏书楼及民众讲习室^[9]。

1.2 捐资扩建模式

相较于完全捐建模式,捐资扩建模式在近代侨乡图书馆发展进程中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呈现出“原有设施为基,侨资助力升级”的特征。该模式多基于地方政府、民间团体或宗族已建成的图书馆基础,华侨华人通过注资实现馆舍规模拓展、功能完善与服务升级,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建设的文化生态。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1929年创办的黎明高中图书室。20世纪80年代图书室复办阶段,旅菲华侨梁披云、黄长水等侨领牵头组织海外乡贤成立“黎明学园董事会”,为图书馆建设累计捐资超500万元人民币^[10]。这笔侨资不仅支撑完成了图书馆主体建筑的扩建工程,还助力馆内引入先进的图书管理系统与数字化设备,使图书馆的藏书容量提升了三倍,成为区域性高校图书馆的典范。再如,广东梅县图书馆始建于1914年,最初由当地乡绅集资兴建,受资金所限,馆舍规模与藏书量均较为有限。20世纪90年代起,旅居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的梅州籍华侨发起“文化反哺计划”,以个人名义或侨团组织形式为图书馆捐资超千万元,分阶段建成了古籍修复中心、电子阅览室、地方文献特藏室等专项设施,既保留了图书馆的历史文脉,又通过侨资注入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充分体现了传统与创新融合的建设智慧^[11]。捐资扩建模式的实践,不仅优化了侨乡图书馆的空间布局与服务效能,更构建起侨乡文化遗产与公共文化服务提升的良性互动机制,为侨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1.3 专项捐赠模式

侨乡地区因独特的侨文化背景,拥有丰富的海

外华侨华人资源,许多海外华侨华人始终心系桑梓,愿意通过多种方式回馈家乡,支持家乡公共设施建设,图书馆建设便是其中的重要回馈方式。华侨华人的专项捐赠形式丰富多样,主要包括图书捐赠、资金捐赠、设立专项基金等。香港著名实业家、慈善家罗世文对新会景堂图书馆的持续捐赠,便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2022年6月,罗世文创立的万胜心连心同学会慈善基金向景堂图书馆捐赠了价值10万元人民币的图书;同年7月,又捐资对馆内自修室和报告厅进行升级改造,优化民众阅读环境;同年10月,进一步捐建“心连心多元文化园”,打造集阅读、研学于一体的文化空间,有效增强了图书馆的文化交流功能^[12]。专项捐赠模式在侨乡图书馆建设中,呈现出多元化与持续性的显著特征。从捐赠内容来看,不仅涵盖图书、资金等基础支持,还延伸至基础设施建设、设备更新、文化活动资助等多个维度;从捐赠形式来看,许多华侨华人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与地方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等方式,保障捐赠行为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部分侨胞还与地方政府或图书馆签订公益合作框架,定期为图书馆提供资源支持,同时参与图书馆发展规划的制定,推动华侨捐赠行为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13]。

2 动因分析

2.1 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情感身份认同

清末民初之际,海外华侨在美洲、东南亚等旅居地遭遇严苛的排华政策,生存与发展处处受限,这也让他们愈发重视与故土之间的文化联结,而捐建图书馆成为他们强化这种联结的重要途径^[14]。台山华侨黄炳礼在遗嘱中特意提及“以图书维系乡邦记忆”^[15],真切反映出华侨希望通过文化反哺的方式,实现自身“身份再本土化”的内心期许。华侨捐建图书馆的行为,本质上是对自身“家乡人”身份的主动确认,他们希望以图书馆为阵地,在侨乡传播文化知识,以此重构族群的文化认同^[16]。深究这一行为背后的动因,实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源于华侨对故土难以割舍的情感认同,以及身为炎黄子孙的文化责任。他们希望通过建设图书馆,让文化知识惠及家乡民众,提升家乡百姓的文化素质,推动家乡的文化发展。另一方面,面对美洲、东南亚等地愈演愈烈的排华政策,华侨希望通过加强与祖国、家乡的联系,维系族群的共同记忆,强化海外侨胞之间的情感身份认同,从而凝聚起族群发展的力量。

随着时代的发展,华侨对家乡的援助重心也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经济援助逐步转向文化传承,侨乡图书馆的发展与完善,正是这一转型过程的典型体现。台山市白沙镇是侨乡文化建设的代表性区域,近代以来,白沙镇华侨的援助多聚焦于基础设施修建、产业培育等经济领域,以此来缓解家乡发展的物质短板,为地方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华侨黄炳礼捐建的白沙图书馆,作为当时粤西地区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不仅开启了白沙镇公共文化服务的先河,更成为了华侨援助从经济导向转向文化导向的标志性实践^[17]。该图书馆的建成,有效打破了基层社会知识传播的壁垒,推动了地方知识普及与文化传播,唤醒了民众的文化自觉,为白沙镇侨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最初动力。

2.2 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的政治参与

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的严峻局势,华侨华人虽身处海外,却始终心系祖国命运,将捐建图书馆与思想启蒙、民族救亡紧密结合,以文化为武器,参与国家政治与民族救亡运动。1912年,旅菲华侨许友超在泉州创办华侨中学图书馆时,特意采购《民约论》《国富论》等西学译著300余册,同时设立“新学讲堂”,每周举办“民主与科学”主题讲座^[18]。1915—1925年间,该讲堂累计举办讲座427场,听众超2.3万人次,极大地推动了闽南地区的民主思想启蒙,让现代民主与科学观念深入人心。

抗日战争时期,华侨捐建的图书馆更被赋予了“救国图存”的政治使命,成为民族救亡的重要文化阵地。菲律宾华侨创办的“中山民众阅览室”、泉州“晋南图书馆”等机构,不仅收藏各类文献资料,更通过举办抗日宣讲、科学知识普及等活动,向民众传播抗日思想,凝聚抗日力量^[19]。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学校图书馆在1938年组织成立“南洋华侨救国读书会”,通过图书流动服务的方式,将抗战书籍送至侨乡各地,向侨乡民众传播抗战思想,充分彰显了华侨将文化启蒙与民族救亡相结合的家国情怀^[20]。温州瑞安华侨图书馆在1941年组建“战时图书流动队”,队员们用竹筐装载图书,深入浙南28个抗日游击区,举办“抗日图片展”64场,让游击区民众及时了解抗战形势。据当地老人回忆,该流动队曾在永嘉山区,用《义勇军进行曲》歌谱换取村民的掩护,形成了独特的“图书换情报”的救亡模式,成为抗战时期文化救亡的生动写照^[21]。1942年,晋江图书馆在华侨资助下启动“侨乡抗战文献

征集计划”,收集日军暴行照片、华侨捐款收据、抗日标语等实物史料2000余件^[22]。其中,旅菲华侨苏祖章捐赠的《马尼拉华侨抗敌委员会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南洋侨胞筹募救国公债的全过程,成为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旁证。

2.3 引入先进方法与理念,推动新图书馆运动在国内的开展

受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推动的“新图书馆运动”影响,华侨将西方现代图书馆理念引入了侨乡。例如:印尼华侨捐资的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率先采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23];晋江图书馆建立借阅制度^[24];文昌华侨中学图书馆推行了分级阅读机制^[25]。这些实践打破了传统藏书楼的封闭性,推动图书馆向“开放、公共、科学化”转型^[26]。1930年,国民政府《图书馆规程》颁布后,华侨捐建的图书馆更成为了政策落地的示范样本。如台山图书馆三次扩建均引入西式建筑设计与管理体制,成为岭南地区公共文化现代化的标杆^[27]。1936年,岭南大学图书馆与华侨史学界合作,出版《华侨文献目录初稿》,收录了海外华侨著述、侨刊、家书等文献3000余种^[28]。其中,“侨乡图书馆研究”专题首次系统分析了华侨捐建图书馆的运作机制,该成果获1937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东亚分会特别奖,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开始进入国际学术视野。

2.4 家庭与地方权威的维系

部分华侨通过持续性捐建图书馆来巩固家族社会地位。黄炳礼在1915年拟定的《白沙图书馆管理章程》中明确:“馆长须由黄氏族人中科举功名持有者或海外留学生担任”,这种制度设计使黄氏家族通过图书馆管理持续垄断地方文化话语权^[29]。该家族三代人先后担任馆长,任职时间长达47年(1906—1953年),在此期间通过“图书采购权”优先收录黄氏族著述,形成了家族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华侨华人通过制定馆规、主导管理实现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使图书馆成为维系家族在地方社会权威的重要工具。

3 影响及意义

3.1 推动了侨乡公共文化设施现代化

在近代国家财政投入不足背景下,华侨捐建图书馆的行为,有效填补了侨乡公共文化设施的空

白,推动了侨乡文化设施从传统宗族私塾的单一模式向现代公共教育体系转型升级。至20世纪30年代,广东五邑、福建闽南等核心侨乡地区,已逐步形成“图书馆+侨刊+学校”的文化综合体,构建起完善的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其中,台山图书馆牵头构建的区域性图书网络,覆盖周边多个乡镇,让基层民众得以便捷获取知识,使当地基层社会的知识普及率提升40%^[30]。侨乡图书馆的现代化转型,不仅体现在馆舍扩建、设备更新等硬件建设方面,更体现在服务模式的创新上。通过引入期刊阅览、学术讲座、图书流动服务等新型服务形式,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阶层壁垒,让文化知识不再为少数士绅阶层所垄断,而是走向普通民众。泉州培元中学图书馆在20世纪20年代引入侨资后,不仅扩建了藏书楼,还定期举办“侨乡青年讲习会”,邀请归国华侨讲述南洋见闻与现代科学知识^[31]。这种将海外知识经验与本土文化传播相结合的形式,让原本局限于士绅阶层的文化活动,向普通侨乡青年开放,吸引了大批青年参与。部分参与讲习会的学员,后来成为当地新式学堂的教师或华侨社团的文化骨干,以点带面推动知识在侨乡的传播,形成了知识传播的“涟漪效应”。

3.2 促进了思想启蒙与社会变革

图书馆作为“启民智、育人才”的重要载体,成为侨乡社会思想启蒙的主阵地,直接推动了侨乡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为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抗战期间,海南华侨中学图书馆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开放流动图书车,深入乡村开展扫盲教育,让大批乡村青壮年识文断字,使当地青壮年识字率提升约25%,有效提升了基层民众的文化素质^[32];温州瑞安华侨图书馆引入大量自然科学类图书,涵盖农业、手工业、轻工业等多个领域,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参考,推动了地方实业技术的革新,助力当地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化实业转型^[33]。侨乡图书馆的知识传播机制,加速了侨乡社会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进程。晋江图书馆在华侨的支持下设立“实业参考部”,专门收录纺织、制鞋等地方特色产业的技术手册与行业资料,为当地华侨回乡创办工厂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持,推动了闽南地区民营实业的发展^[34];江苏南通华侨图书馆则通过传播现代科学知识、法治观念与商业理念,培育了侨乡社会的现代性要素,包括理性思维、技术崇拜和契约精神^[35]。这些要素成为日后闽粤侨乡地区率先接纳全

球化浪潮、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

3.3 推动了图书馆管理现代化与制度创新

华侨华人在海外经商、生活的过程中,接触并积累了丰富的现代管理经验与制度知识,他们将这些先进的理念与经验带回侨乡,融入到图书馆的建设与管理之中,成为推动侨乡图书馆从传统藏书楼向现代公共图书馆转型的核心力量。华侨在支持图书馆建设的过程中,并非只关注馆舍扩建、设备更新等硬件方面的投入,更注重图书馆服务功能的完善与管理制度的科学化,推动图书馆的管理模式从以往的经验化运作逐步向规范化、标准化转变。同时,不少华侨还通过设立专项奖学金、资助专业培训项目等方式,选送侨乡本地的青年赴海外学习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相关专业知识,为侨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储备专业人才。这些举措不仅直接提升了侨乡图书馆的专业服务水平,也为日后全国范围内的图书馆制度改革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华侨大学厦门校区的郑年锦图书馆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馆由印尼著名侨领、华侨大学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印尼马龙佳集团董事长郑年锦先生捐资200万美元兴建,馆内采用国际先进的图书馆管理模式,馆藏资源兼顾学术性与公共性,成为侨乡高校图书馆现代化建设的典范^[36]。

华侨华人捐建的图书馆,在管理运营上始终秉持实用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原则,十分注重图书资料的丰富性与科学性,馆藏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地方文献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了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的管理模式,为现代图书馆管理体系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37]。大量侨资的持续注入,显著改善了侨乡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条件,让当地民众的知识获取渠道更为便捷,同时也推动了侨乡现代图书馆管理体系的构建,为侨乡图书馆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3.4 构建了跨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与情感载体

郑年锦先生捐赠建设的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图书馆,不仅以其名字命名,彰显侨胞的贡献,更在馆内设立“印尼文化角”,收藏印尼文化、历史、经济等相关文献,定期开展中印尼文化交流活动,持续促进了中印尼两国的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38]。这种以图书馆为载体的跨文化交流,让侨乡图书馆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即便在当代,华侨捐建的图书馆仍持续发挥着情感联结的作用。台山图书馆

现存的大量华侨捐赠档案,详细记录了近代华侨的捐建历程与家国情怀,不仅成为图书馆的珍贵馆藏,更成为研究海外华人史、侨乡文化史的重要文献资源,让华侨的家国情怀得以代代传承。华侨华人捐建侨乡图书馆的行为,是对家乡文化事业的实质性支持,这份文化自觉与责任担当,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为侨乡社会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文化动力。侨资的持续注入,极大缓解了侨乡地区文化建设的财政压力,让原本文化资源匮乏的侨乡,得以迅速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华侨的捐赠形式丰富多样,既有直接的资金支持,也有图书、设备等实物捐赠,还有技术援助、人才培养等智力支持,全方位助力了侨乡图书馆的事业发展。

4 结束语

华侨参与侨乡图书馆建设的过程,本质上是一场基于文化资本再分配的社会实践^[39]。它在进一步消除了传统城乡之间、本土与海外之间的文化隔阂,使侨乡在保持地方特色的同时,具备更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华侨华人对侨乡图书馆的投入与参与,不仅是物质资源的馈赠,更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投资与社会工程。其深远影响体现在知识生态的重构、公民意识的培育、文化认同的强化以及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多重维度。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于不同侨乡地区图书馆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华侨捐赠行为背后的动机谱系,以及数字时代下侨乡图书馆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新角色,从而深化对华侨文化贡献与地方发展互动关系的理论理解。

参考文献:

- [1] 彭松林,李臻.我国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分析[J].图书馆,2020(7):14-19.
- [2] 张婧.中国图书馆学会推动全民阅读工作模式研究[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1(4):43-48.
- [3] 杨浩.论侨乡开平家族图书馆及其发展[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9(9):160-163.
- [4] 田慧芳,潘家芳.近代华南侨乡侨助公共图书馆事业探究[J].图书馆学刊,2023(3):106-110.
- [5] 何义珠,郑丽,留洪华.“文化+商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一种范式:基于青田侨乡文化主题图书馆的考察[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3(7):70-72.
- [6] 潘启亮,侯东栋.侨批文化:侨乡高质量发展的文化路径[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1-13.
- [7] 叶枫红.谈谈广东和福建的侨乡建设[J].八桂侨史,1988(2):1-8.
- [8] 曲晓玮,洪文梅.侨胞捐建广东图书馆之研究[J].图书馆论坛,2004(6):155-158.
- [9] 钱源初.简明江门古代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3.
- [10] 任贵祥,李盈慧.华侨与国家建设[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1] 肖文评,周云水,钟晋兰,等.客家文化教程[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1.
- [12] 李新,韩信夫,姜克夫.中华民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3] 王焕芝.新时代泉州籍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资兴学的特点与影响因素[J].八桂侨刊,2023(4):55-64,95-96.
- [14] 魏明枢.侨乡的起源[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3.
- [15] 任贵祥,李盈慧.华侨与国家建设[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6] 郑师渠,史革新,刘勇.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 [17] 田若虹.岭南五邑海洋文化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
- [18] 洪卜仁.厦门华侨纪事[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 [19] 林勇.侨力资源与福建侨乡[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259.
- [20] 上官小红.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18.
- [21] 蒋勇军.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研究(1927—1949)[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5.
- [22] 陈俊林.陈嘉庚精神的文化思想源流[D].厦门:厦门大学,2017.
- [23] 李新,孙思白,朱信泉,等.中华民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4] 王春光.晋江经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2.
- [25] 段宇锋,金晓明.中国公共图书馆创新案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
- [26] 陈英.基于美国影响的民国图书馆事业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16.
- [27] 薛菁,翁伟志.闽都教育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28] 钱源初.五邑大学侨乡文化研究三十年(1994—2024)[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11,92.
- [29] 薛菁,翁伟志.闽都教育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30] 汤旭岩,刘伟成.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服务[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
- [31] 李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思白,等.中华民国史[M].北京:中华书局,

- 2011.
- [32] 赵兴胜,徐畅,高纯淑,等.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33] 李异,管彦达.浙江文史记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
- [34] 杨力.中国抗战大后方中间党派文献资料选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
- [35] 贺东航.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路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36] 林勇.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闽商[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
- [37] 朱丽娜,王华.港澳同胞、华侨华人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百年捐献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3):99-104.
- [38] 刘一斌.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故事[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
- [39] 杨洁.广东五邑侨乡图书馆的公益性发展研究:以新会景堂图书馆为例[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0(5):53-56.

Models, Motivations, and Impacts of Overseas Chinese Donations to Libraries in Their Hometowns in Modern Times

DENG Yuxiang

(Dongguan Songshan Lake Library, Dongguan 523808, China)

Abstract: Modern libraries serve as crucial platforms for promoting reading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nd fostering a learning-oriented society. In modern times, libraries in hometowns of overseas Chinese have developed unique models through collaboration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local authorities. Donations from overseas Chinese not only filled the gap in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caused by insufficient state funding, but also introduced modern Western library concepts through the New Library Movement, thus facilit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libraries into modern public libraries in these hometowns of overseas Chines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ibraries in hometown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s. Based on archival record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overseas Chinese publications, it identifies three models: fully donated construction, expansion through donations, and targeted donations. It analyzes the motivations behind these model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cultural identity, national salvation, introduction of modern concepts, and maintenance of local social cohesion.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libraries in hometowns of overseas Chinese; library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史文涛)